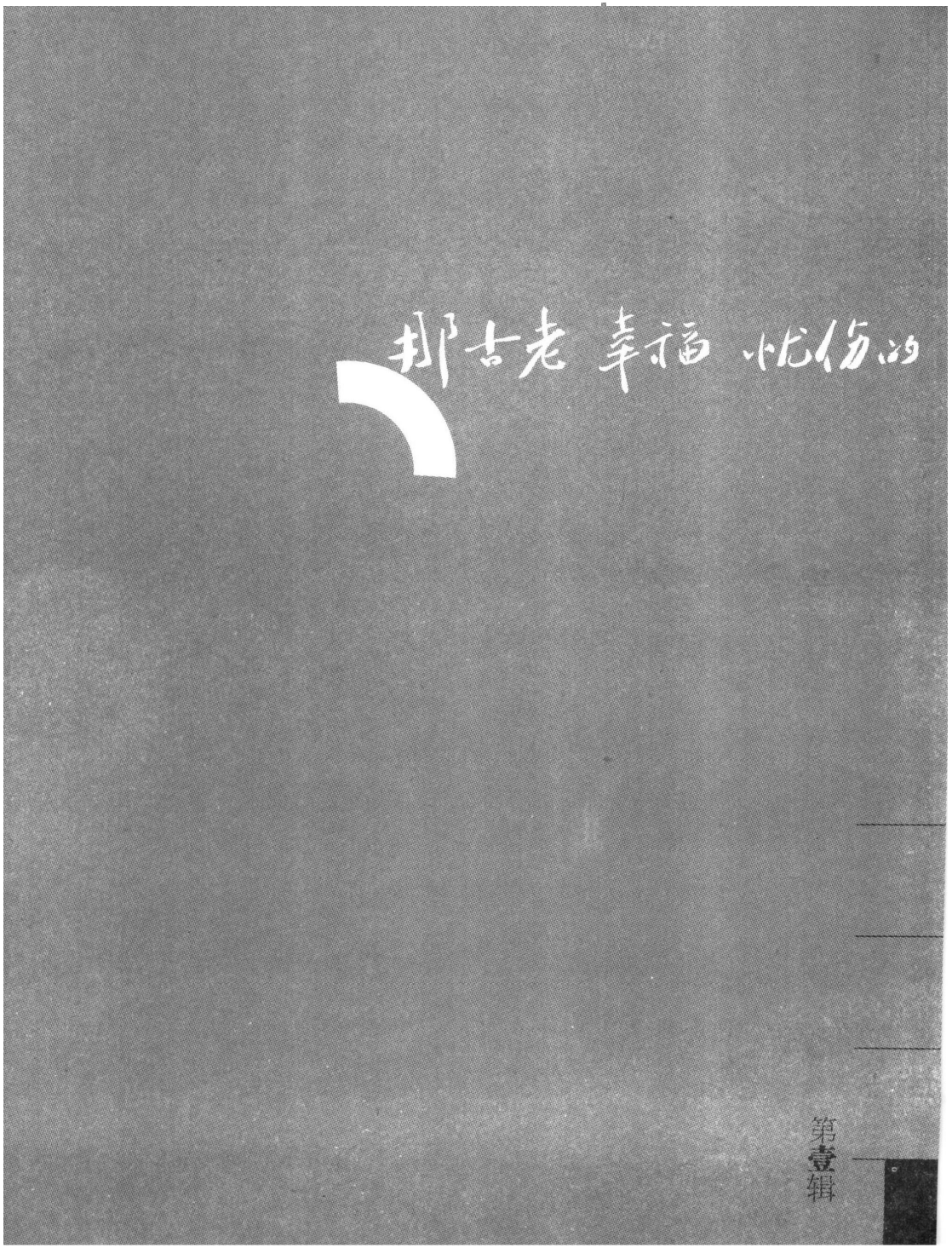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1978之恋

王 陆

1978年，我18岁，考到辽宁师范学院（现为辽宁师范大学）。入学那天，下小雪，我戴着小瓜皮解放帽，想找中文系的楼。我看到有一个包着破头巾的妇女在我前面走，我就先喊她一声阿姨，问她知不知道中文系的楼怎么走。她说她也在找中文系，她也是新生。我们俩就一块儿签字报到，一块儿走进教室。我们俩同班，我们俩差十四岁。后来我一直叫她孟大姐。她是班里最大的，是一个母亲，我是班里最小的，是一个中学生。在我们俩中间的同学是各种年龄各种职业，下乡知青最多，工人其次，还有卖水果的、修理自行车的和军人。我们的第一堂课是英语，一个刚从俄语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教了我们八个字母，从A到H。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字母旁边标上汉字，跟老师很努力地读。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很多男同学都聚在一起卷旱烟抽，走廊和教室里是乌烟瘴气，满耳粗话和尖锐的话。在宿舍也是一样。那时我很愿意挤在他们堆里，听他们讲。在他们中间，我什么都不如他们。记得教我们鲁迅课的张老师开玩笑说：这里哪像大学？这里就像工农革命讲习所。那时我们都渴望了解文明的东西，伟大的文学是一个，自由的思想是另一个。我非常幸运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但我能和这些比我年长的比我有思想的青年们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。 1978年，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坐在大学课堂里。

1978年的校园很破，教室也很破，图书馆更破。图书馆的书库是刚刚揭开封条的，每一本书都落满尘埃。但仍有一些书还没有完全解放，要借阅是有限制的，是供批判用的，比如沈从文的书、肖洛霍夫的书，等等。记得有一位俄苏文学老师，他姓杨，他讲高尔基讲得不多，讲得很有敬意；但他讲肖洛霍夫讲得很多，先是绘声绘色地讲，然后是大声批判，说肖洛霍夫拍过赫鲁晓夫的马屁，也是一个修正主义者。但他第二天又积极组织我们看根据肖洛霍夫作品改编的苏联电影，有邦达丘克主演的《一个人的遭遇》，有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和《静静的顿河》。这些在当时还是禁

片,他把它们作为批判资料让我们看了。我们整整看了三天,把其他作家的课都占用了。看完了,我们都很热烈,他却什么也不说。考试的时候,他只考高尔基,不考肖洛霍夫。我们在上大四时,这个杨老师就得癌症病逝了。现在回想,杨老师那时是中年,对‘文革’后的现实仍然是小心的,知道怎么曲折地表达认识。现在我也到了中年,才理解老师,他有文学的良心和世俗的苦心。当然,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像他那样,其实在1978年和1979年的大学文科讲坛上,说假话,搞形而上,搞一家之言,仍然是主要风气。这种风气是‘文革’的灵魂的延续,我们对此都深恶痛绝。记得那时有一位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老师,他是刚从‘五七干校’解放出来的,是受了很多的苦的,按理说他对这个专业应该是有思考的,但他讲课完全是“文革”师爷的路子,讲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问题时,就像讲梦话一样。我们开始还给他提醒一些现实的情况,想与他有一些科学争论,但这个老师很不习惯这样,他用了一堂课的时间训斥我们的信仰有问题。后来我们根本不搭理他,甚至当着他的面走出教室,他的课就没有几个人听了。那时,我们不在乎考试成绩,我们很在乎科学的东西和自由的东西,我们很怀疑讲义,也怀疑那些在政治上四处讨巧的作家和作品。那是一个思想破土而出的时代。我们都拥到了图书馆。1978年的辽师图书馆是一个自由的地方,开禁的书籍和杂志是我们的中心,我们再没有别的其他欲望。那时的图书馆是多么小啊!我们往往一早就跑到图书馆门口排队,等着开门能占一个座位。大学四年,我们在图书馆的时间比在教室的时间要长。自由的阅读燃烧了我们。当时背过的讲义和所作的笔记现在都是一堆废纸了。而当时读过的好的作品,现在还在心里。虽然1982年我们毕业的时候,还有一些思想和文学禁区没有打破,还有一些书仍然贴着封条,像爱伦堡、索尔仁尼琴、胡风等,他们的书依然不能见天日,但是“左”的东西毕竟不像以往那样专横了。我工作以后就陆续读到了他

们。现在和以后的大学生可能不能想象那样的事情,但1978年就是那样。

1978年是一个阵地界限,有人负隅顽抗,有人吹起号角。《光明日报》的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》是政治号角。实话说,我们当时年轻,对这篇文章的认识还非常浅,真正的认识还是在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,回头反复读才领悟到了一二。但是,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小说《伤痕》就不一样了,它一发表,就在我们中间爆炸了。这是当时最激越的一声文学号角。那时,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。从文学到政治,从写诗到办杂志,那时我们真是不怕天高地厚。记得当时我们的教室仍然挂着华国锋的领袖像,下面还有一个标语"你办事,我放心",但有一天上课的时候,我们班的陈洪迪上去把这个像给扯下来了,把标语也给撕了。这在当时是一个突发事件。我们很兴奋,我们的思想都在刚刚解放的火头上,但那个上课的女老师给吓跑了,她把院系领导和保卫科的人都给找来了。就在陈洪迪等待处理的时候,中央发生了大的变化,邓小平出来了。我们系一位领导事后说,陈洪迪是顺应了政治潮流,要不然,他这个反革命是没跑的。这句话很有政治经验。但这句话不对!不是陈洪迪顺应了政治潮流,而是政治潮流顺应了人心,这才是1978年。大学毕业后,我再也没有见到陈洪迪。陈洪迪年长我很多岁,现在也快有五十了吧!他现在做什么呢?我在心里一直很念及他,因为我那时有很多新东西都是先从他那儿知道的,如索尔仁尼琴的《伊万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和叶文福的长诗。我记得有一天中午他在班里朗诵叶文福的诗。他的声音并不好,但他有激情,我们一边吃午饭,一边静静地听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,情与景完全不一样了。现在谁还知道叶文福的诗呢?这位写下新时期第一个反腐败作品的勇敢诗人好像是彻底地消失了。书店有这么多的诗选或诗集,我都没见到叶文福的名字。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而为,还是风气使然。1978年,作家和艺术家是做得最多的,是他们首先说了真话,是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他们表明我们这个时代完全能够战胜虚假和愚昧！他们在前面顶着风雨，后面是政治、经济和各行各业在悄悄跟进。

1978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大连是下着大雪的。那天我们中文系搞了一个晚会。其实,那算不上晚会,那只是一个会餐。在大食堂里,很冷,我们同学都在猛吃炸肉丸子和炸刀鱼，还喝一点啤酒。77级有一个男生拉着一个女生的手走到大厅中间摆上跳舞的姿势，这让我们的心一下子动了起来,我们把他俩团团围住。他俩不会跳舞,但他俩非常想跳。那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场舞会,有《送你一朵玫瑰花》的音乐,有美丽的感情,有先锋的意气。现在,天天弦歌袖舞,宝马香车,那时的一切都不算什么了。这就是发展。这对我们是一个逼迫。我们本来是有1978 年的根基的,但这个根基很薄,我们只是一片苇草,无法成长为树林,所以,我们慢慢出现了问题 精神越来越小,越来越干燥 手越来越长,越来越湿黏 能做的不肯做，不能做的偏要挣扎着去做。有一个女同学，在学校的时候曾经演过《娜拉》,很有风头。最近听说,她在国内办完了离婚手续,去日本嫁给了一个很老的日本老头,还在那边生下一个孩子。她比我大好几岁,现在应该是四十四五岁的人了，这样的大龄还要努力为绿卡而生育应该是很不容易的。我想,不管她是什么原因做出这个选择的,她的心一定是很艰难的。还有一个在机关工作的男同学，他原来是很有修养的，热爱莎士比亚,能用原文背诵《奥赛罗》的大段台词。最近听说他出事了。他有一个青春健康网站,他利用那里做掩护卖黄碟,拉皮条,卖白粉,结果让公安局给抄了,给了重判。某次酒醒之后,我想：1978年的显性思想统统都蜕变成暗物质了吗？1978年的自由飞翔,现在都要服从这样的栖息方式吗？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种悲观：我们不可救药！

坏消息不断地有，最近，杨大健同学病逝了。他也是年长我好几岁，是我们班在专业上很努力的同学。想到他中年病死，我有一种飘零的感

觉,这种感觉又延伸出一个疑问:我们在精神上还有回旋余地吗?这个疑问让我非常难过,我甚至不能控制自己。今年春天我离开大连,一个人去俄罗斯旅行。其实,去了俄罗斯又怎么样?从贝加尔湖到圣彼得堡,一路都是庸俗的眼神。我想找到某种情绪资源或者是某种思想遗址,但我找不到。我只好一路思考,想到精神生态问题。二十多年来,我为什么没有长成一棵树?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为一片森林?这种思考没有答案。我在圣彼得堡时,听说谢斯特罗列茨克镇有大作家左琴科的墓地。我找到那儿,看到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墓碑。我记起了左琴科的话:"我们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堕落负有责任。"

我问墓碑:我的责任在哪儿?

墓碑答我:你贩卖了你的器官。你参与了对公共精神的猥亵。你讨价还价。你纵欲。你萎靡不振。你勾搭权力和金钱。你形而下。你对人类的痛苦幸灾乐祸。你为罪恶的勾当添枝加叶。

我抚摸墓碑,左琴科一动不动,我却在摇荡。我终于往回走,我回到主题:1978年是光荣的,却难以恢复。如果1978年成为遗迹,那样也好,总会有一些残简断章传下去。但是,如果1978年成为遗迹后又被夷为平地,甚至在这平地上面盖上了私人别墅呢?其实我这个想法很偏离主题了,说出去,会惹人嘲笑,不合时宜。

另一段城南旧事

余光中

林海音的小说名著《城南旧事》写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故事,所谓城南,是指北京的南城。那故事温馨而亲切,令人生怀古的清愁,广受读者喜爱。但英子长大后回到台湾,另有一段‘城南旧事’,林海音自己未写,只好由女儿夏祖丽来写了。这第二段旧事的城南,却在台北。

初识海音,不记得究竟何时了。只记得来往渐密是在六〇年代之初。我在‘联副’经常发表诗文,应该始于一九六一,已经是她十年主编的末期了。我们的关系始于编者与作者,渐渐成为朋友,进而两家来往,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。

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。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,余家住在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,都在城南,甚至同属古亭区。从我家步行去她家,越过江州街的小火车铁轨,沿街穿巷,不用十五分钟就到了。

当时除了单篇的诗文,我还在‘联副’刊登了长篇的译文,包括毛姆颇长的短篇小说《书袋》和‘生活’杂志上报道拜伦与雪莱在意大利交往的长文《缪思在意大利》,所以常在晚间把续稿送去她家。

记得夏天的晚上,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全家去夏府喝绿豆汤。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,都会欣然跟去,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,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,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“捞金鱼”。

海音长我十岁,这差距不上不下。她虽然出道很早,在文坛上比我先进,但是爽朗率真,显得年轻,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。但径称海音,仍觉失礼。另一方面,要我像当时人多话杂的那些女作家昵呼“海音姐”或‘林大姐’,又觉得有点俗气。同样地,我也不喜欢叫什么‘夏菁兄’或“望尧兄”。叫‘海音女士’吧,又太做作了。最后我决定称她‘夏太太’,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叫定了‘夏先生’,似乎以此类推,倒也顺理成章。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,不够交情。

夏家的女儿比余家的女儿平均要大十二三岁,所以祖美、祖丽、祖葳领着我们的四个小珊转来转去，倒真像一群大姐姐。她们玩得很高兴，不但因为大姐姐会带，也因为我家的四珊，不瞒你说，实在很乖。祖焯比我家的孩子大得太多，又是男生，当然远避了这一大群姐妹淘。

不过在夏家做客，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，什么呢，不是陌生，而是奇异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，他们不但说京片子，更办“国语日报”,而且在‘国语推行委员会’工作。他们家高朋满座,多的是卷舌善道的北京人。在这些人面前，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，ㄓㄔ不卷，ㄗㄙ不分，一口含混的普通话简直张口便错。用语当然也不道地,海音就常笑我把‘什么玩意儿’说成了‘什么玩意’。有一次我不服气，说你们北方人‘花儿鸟儿鱼儿虫儿’,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‘肉麻儿’。众人大笑。

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。单说我们厦门街这条小巷子吧，曾经住过或是经常走过的作家,至少就包括潘垒、黄用、王文兴与‘蓝星’的众多诗人。巷腰曾经有《新生报》的宿舍,所以彭歌也常见出没。巷底通到同安街,所以《文学杂志》的刘守宜、吴鲁芹、夏济安也履印交叠。所以海音也不时会走过这条巷子，甚至就停步在我家门口，来按电铃。

就像旧小说常说的‘光阴荏苒’,这另一段‘城南旧事’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，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。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了家。从一九七四年起，我们带了四个女儿就定居在香港。十一年后我们再回台湾，却来了高雄，常住在岛南，不再是城南了。厦门街早已无家可归。

夏府也已从城南迁去城北，日式古屋换了新式的公寓大厦，而且高栖在六楼的拼花地板，不再是单层的榻榻米草席。每次从香港回台，几乎都会去夏府做客。众多文友久别重聚，气氛总是热烈的，无论是餐前纵谈或者是席上大嚼，那感觉真是宾至如归，不拘形骸到喧宾夺主。女主人天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生丽质的音色,流利而且透彻,水珠滚荷叶一般畅快圆满,却为一屋的笑语定调或为众客共享的耳福。夏先生在书房里忙完,往往最后出场,比起女主人来也‘低调’多了。

海音为人,宽厚、果决、豪爽。不论是做主编、出版人或是朋友,她都有海纳百川的度量,我不敢说她没有敌人,但相信她的朋友之多,友情之笃,是罕见的。她处事十分果决,而且决定得很快,我几乎没见过她当场犹豫,或事后懊悔。至于豪爽,则来自宽厚与果决 宽厚,才能豪,果决,才能爽。跟海音来往,不用迂回 跟她交谈,也无须客套。

这样豪爽的人当然好客。海音是最理想的女主人，因为她喜欢与人共享,所以客人容易与她同乐。她好吃,所以精于厨艺,喜欢下厨,更喜欢陪着大家吃。她好热闹,所以爱请满满一屋子的朋友聚谈,那场合往往是因为有远客过境,话题新鲜,谈兴自浓。她好摄影,主要还是珍惜良会,要留刹那于永恒。她的摄影不但称职,而且负责。许多朋友风云际会,当场拍了无数照片,事后船过无纹,或是终于一叠寄来,却曝光过度,形同游魂,或阴影深重,疑是卫夫人的墨猪,总之不值得保存,却也不忍心就丢掉。海音的照片不但拍得好,而且冲得快,不久就收到了,令朋友惊喜加上感佩。

所以去夏府做客,除了笑谈与美肴,还有许多近照可以传观,并且引发话题。她家的客厅里有不少小摆设，在小鸟与青蛙之外，更多的是象群。她收集的瓷象、木象、铜象姿态各殊,洋洋大观。朋友知道她有象癖,也送了她一些,总加起来恐怕不下百头。这些象简直就是她的‘象征’,隐喻着女主人博大的心胸,祥瑞的容貌。海音素称美女,晚年又以‘资深美女’自嘲自宽。依我看来,美女形形色色,有的美得妖娆,令人不安 海音却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种。

这位美女主编,不,资深美女加资深主编,先是把我的稿子刊在‘联

副”,继而将之发表于“纯文学月刊”,最后又成为我好几本书的出版人。我的文集《望乡的牧神》、《焚鹤人》、《听听那冷雨》、《青青边愁》,诗集《在冷战的年代》,论集《分水岭上》都在她主持的“纯文学出版社”出书,而且由她亲自设计封面,由作者末校。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,我把编好的书稿交给她后一切都不用操心,三四个星期之后新书就到手了。欣然翻玩之际,发现封面雅致大方,内文排印悦目,错字几乎绝迹,捧在手里真是俊美可爱。那个年代书市兴旺,这大本书销路不恶,版税也付得非常爽快,正是出版人一贯的作风。

“纯文学出版社”经营了廿七年,不幸在一九九五年结束。在出版社同人与众多作者的一片哀愁之中,海音指挥若定,表现出“时穷节乃见”的大仁大勇。她不屑计较琐碎的得失,毅然决然,把几百本好书的版权都还给了原作者,又不辞辛劳,一箱一箱,把存书统统分赠给他们。这样的豪爽果断,有情有义,有始有终,堪称出版业的典范。当前的出版界,还找得到这样珍贵的品种吗?

海音在“纯文学出版社”的编务及业务上投注了多年的心血,对台湾文坛甚至早期的新文学贡献很大。祖丽参预社务,不但为母亲分劳,而且笔耕勤快,有好几本访问记列入“纯文学丛书”。出版社曲终人散,虽然功在文坛,对垂垂老去的出版人仍然是伤感的事。可是海音的晚年颇不寂寞,不但文坛推重,友情丰收,而且家庭幸福,亲情洋溢。虽然客厅里挂的书法题着何凡的名句“: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”,毕竟有何凡这么忠贞的老伴相互“牵手”,走完全程。而在她文学成就的顶峰,《城南旧事》在大陆拍成电影,赢得多次影展大奖,又译成三种外文,制成绘图版本。

在海音七十大寿的盛会上,我献给她一首三行短诗,分别以寿星的名字收句。子敏领着几位作家,用各自的乡音朗诵,颇为叫座。我致词说:

“林海音岂止是长青树,她简直是长青林。她植树成林,我们就在那林阴深处……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。现在是女强人的时代,照理成功的女人背后也必有一位伟大的男性。可是何凡和林海音,到底谁在谁的背后呢 还是台语说得好 夫妻是‘牵手’。这一对伉俪并肩携手,都站在前面。”

暮色苍茫得真快，在八十岁的寿宴上，我们夫妻的座位安排在寿星首席。那时的海音无复十年前的谈笑自若了。宾至的盛况不逊当年,但是热闹的核心缺了主角清脆动听的女高音，不免就失去了焦聚。美女再资深也终会老去，时光的无礼令人怅愁。我应邀致词，推崇寿星才德相侔，久负文坛的清望,说一度传闻她可能出任文化部长:可是,一个人做了林海音,还希罕做文化部长吗 ?这话突如其来,激起满堂的掌声。

四年后时光的无礼变成绝情。我发现自己和齐邦媛、痖弦坐在台上，面对四百位海音的朋友追述她生前的种种切切。深沉的肃静低压着整个大厅。海音的半身像巨幅海报高悬在我们背后，熟悉的笑容以亲切的眸光、开朗的齿光煦照着我们,但没有人能够用笑容回应了。刚才放映的记录片,从稚龄的英子到耋年的林先生,栩栩的形貌还留在眼睫,而放眼台下,沉思的何凡虽然是坐在众多家人的中间,却形单影只,不,似乎只剩下了一半,令人很不习惯。我长久未流的泪水忽然满眶,觉悟自己的‘城南旧事”,也是祖丽姐妹和珊珊姐妹的‘城南旧事”,终于一去不回。半个世纪的温馨往事，都在那幅永恒的笑貌上停格了。

二〇〇二年八月于高雄左岸

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

高建群

草原献给这个世界的伟大儿子

“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,他们是从哪里来的—— 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!”这是当成吉思汗的铁蹄,即达莫斯科城下的时候，一位俄国历史学家的惊呼。

相信在当时的世界上，许多国家的许多人都这样惊呼过。

当他们早上一觉醒来,睡眼惺忪,登上城堡,偶然一看时,顿时惊呆了。只见在城外,像聚集一团又一团乌云似的,布满了蒙古大兵。马在嘶鸣，剑在骑手的手中呼呼生风，蹄铁焦急地敲着土地，等待冲锋的信号。他们是谁？是天外来客，是火星人吗？

翻开大蒙古地图，我们看到，它那时大约占据了世界三分之二的开化地区,除了西欧以外,除了一部分的印度,一部分的非洲以外,除了尚待开发的美洲以外，蒙古人差不多用他们的马蹄，把这个世界重新犁了一遍。

中原大地成为蒙古国的大汗领地。辽阔的西域成了蒙古国的察合台汗国。现在的庞大的俄罗斯成了蒙古国的金帐汗国。而两河文明的发源地波斯湾，那时是蒙古国的伊尔汗国。

世界在蒙古军队到来之前和到来之后，完全成了两个样子。正如汤因比所说，是成吉思汗把东西方世界联系在一起的，是成吉思汗把各文明版块联系在一起的，是成吉思汗把静止的割据的局面打破的。

以俄罗斯为例。

在成吉思汗到来之前，俄罗斯的原野上散布着许多小公国，他们一个城堡就是一个国家，一条流域就是一个民族。这时成吉思汗的铁骑来了。它把它们统一在了一个叫金帐汗的蒙古王国里，而在金帐汗国慢慢地衰落之后，在莫斯科，从这个蒙古国的废墟上，俄罗斯大公国诞生了。

它成长为一个大国。

成吉思汗完全敢这样说：这个世界是可以以他来划分的，即他没有到来的阶段和到来之后的阶段。

在西域大地上行走的时候，你发觉，大地上的所有那些重要的地理名称,都是以蒙语来命名的。在那时候你能强烈地感觉到,成吉思汗的印迹是如此深入地楔入历史深处和大地深处。

阿尔泰山第一高峰叫‘奎屯山’,这是成吉思汗为它命名的,意思是“多么寒冷的山冈”啊!东西走向的阿尔泰山,至这里,结成一个海拔四千三百七十四米高度的冰疙瘩,寒光闪闪地横亘在中亚细亚地面,威严、圣洁、厚重。

这奎屯山在成吉思汗之前叫什么名字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这名字自他开始。而在奎屯山之后,由于它成为中国、前苏联、蒙古的三国交界处,因此才在盛世的年代,易名友谊峰。后来上世纪六十年代伊塔事件后,中苏两国交恶,周恩来一拍桌子说:“有什么友谊可言?”于是友谊峰再次易名叫‘三国交界处’。上世纪末,它又恢复‘友谊峰’这个称谓了。而在二○○○年版的中国最新地图上，它又恢复成吉思汗为它命名的“奎屯山”这个称谓了。为什么恢复?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更威严大器一些？

奎屯山的西侧，是一个三十公里长的大峡谷。这大峡谷自峰顶向西，连转六个弯子。奎屯山消融的雪水,在这六个湾子中积水成湖,于是形成六个清澈幽蓝、寒气逼人的湖泊。这六个湖泊是连在一起的，像一串项链。

湖泊的名字叫哈纳斯湖。它的名字亦是成吉思汗给起的，意思是美丽的湖泊。

而阿尔泰山一句,也是蒙语,它的意思是盛产金子的山啊。

如果不身临其境,你永远也无法想象出,这些高山、湖泊、草原、河流有多么高贵和美丽。高大挺拔的西伯利亚冷杉、西伯利亚云松、西伯利亚落叶松与山峰同高，它们在中亚的梦幻般的阳光下闪现着妖娆的身姿。湖边的草地上开满了野牡丹花，而在每一棵野牡丹花的旁边，都伴生着冬虫夏草。图瓦族小姑娘背着背篓，穿着裙子，正在草原的深处采野草莓——野草莓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草原，将大地染成朝霞的颜色。

哈纳斯曾是成吉思汗的军马场。

如今，他的那些养马人的后裔还在。他们是蒙古族中的图瓦人部落。

这里是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，踏上征服世界的道路所开始的地方。成吉思汗率领他的庞大的帝国军队,在这里修整了三年。尔后兵分两路,一路穿越奎屯山冰大坂,一路打通伊犁河谷,然后两支部队成钳式攻势,直扑欧亚大平原。

阿勒泰城的旁边，额尔齐斯河北岸，有个平顶的石头山，叫平顶山。据说,成吉思汗就是站在这平顶山上,召开西征誓师大会的。

而在天山与阿拉套山的夹角,赛里木湖畔,有一块美丽的草原,叫博尔塔拉。

“博尔塔拉”的蒙语是“青色的草原”。据说,这里是蒙古族吐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以后落脚的地方。当年西征的一支队伍，在东欧平原停驻了几百年以后，突然思念起了家乡，于是他们一路打仗，开辟了一条道路，又回到了故乡。清朝政府把他们安置在这一块青色的草原上。

我曾经在赛里木湖畔小住过几天。这个湖泊的水是咸的，据说它与遥远的里海的水是相通的。湖水在白天的时候，湖面的色彩随着太阳的色彩、乌云的色彩、天山山峰的色彩,随时变化,一会儿整个湖面闪耀着银光，一会儿则幽蓝，一会儿又变成乌黑乌黑的颜色。四周的天山峰峦，像高擎的手掌，伸开五指将这座山顶湖泊高高托起。

最美丽的时刻是太阳将要从天山的那一面落下去的那一刻。

落日通红，太阳透过垭口和伟岸的塔松，将它的圣洁的佛光像探照灯一样斜射过来。整个湖面笼罩在一片如梦如幻的红光中。湖边零零散散围湖而设的蒙古包和哈萨克毡房，冒着一股股炊烟。用膳的时候到了，毡房或蒙古包门口,每每可见有老太太或老太爷,在地上铺一块毡子,虔诚地跪在那里，面对太阳落下的那个方向，双手合十，一边深深地叩头，一边嘟嘟囔囔地祈祷。

而乘着晚霞归来的牧羊人，正在唱歌。一边唱一边用马鞭轻轻地磕击着马镫。

他先唱一首《美丽的博尔塔拉》：

在那阿拉套山辽阔的地方，
有赛里木湖环绕的地方，
有一座美丽富饶的城市，
那就是我那可爱的家乡，
美丽的博尔塔拉。
啊……啊……
那就是我那可爱的家乡，
美丽的博尔塔拉。

唱完一首《美丽的博尔塔拉》,骑手还有兴犹未尽之感。这时,看见草原深处那像一条银色的带子一样的克鲁伦河，正缓缓地，如同蜜汁一样流过。骑手于是又即兴唱起关于它的歌：

古老神奇的克鲁伦河，

从这里缓缓流过，
神奇地滋润着茫茫草原，
在这里有多少美好的传说。
千折百回一路歌，
祝福草原多么绿色，
日月伴你向前方，
留下千秋无量功德。

“日月伴你向前方，留下千秋无量功德”这结束句，是用浑厚的长调唱着的。一位诗人说过，你要知道蒙古人的长调有多长，告诉你吧，它和一个人的一生一样长。现在，正是在这样的长调中，牧人回到了家里。家中的祈祷已经结束，手抓羊肉和奶茶已经摆在帐篷外的方桌上了，于是人们开始用晚餐。

而夜，慢慢地深了。

草原之夜像海一样深沉、静寂、安详。大地一呼一吸，在吐绽着芬芳，群星像野花一样布满了天空。哦，忘了告诉你了，这里不远处，穿过成吉思汗西征大军开辟的那个果子沟，沟的那边，伊犁附近，就是那著名歌曲《草原之夜》的诞生地。那地方叫克克达拉草原。

闻名遐迩的罗布泊，它也是蒙语。蒙古人叫它“罗布淖尔”。“淖尔”是湖泊、海子的意思，所以现代人将它简称罗布泊。不过罗布淖尔荒原这个称谓现在还叫。

罗布淖尔荒原与吐(鲁番)哈(密)盆地中间，隔着一座东西走向的大山。当我从这座山的一个垭口穿过时，我问随行的地质队员这山叫什么名字，他们说这山叫“库鲁克塔格山”，而旁边靠近迪坎尔绿洲的，那山叫“觉罗塔格山”。“库鲁克”是蒙语“干”，“塔格”是蒙语“山”，这样我们知道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